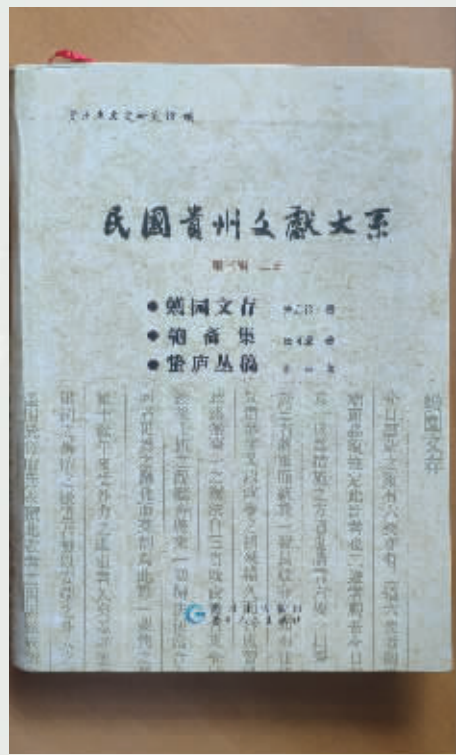




黔籍话旧



《民国贵州文献大系》收入《夔园文存》。



朱启铃及夫人旧照。

朱蠖公及其纂著

特约撰稿人 王尧礼 文/图

紫江朱启铃先生,字桂辛,号蠖公,是近代中国的著名人士,旧时有很高的知名度,现在人们也还不时提起他。

朱先生做过清末的东三省蒙务督办、津浦铁路督办、京师外城警察厅厅长,北洋政府的内务部总长、交通部总长等职。朱先生主持改建正阳门城楼,打通东西长安街、南北长街,开放南北池子,扩大天安门广场,创办北京第一个公园——中央公园,修筑环城铁路,开办中国第一个博物馆——古物陈列所,创建传染病医院,扩充游民工艺所。这些大事,都是他在短短四五年内,人力物力财力都很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。

朱先生一生最大、最为人称道的成就,是创设了中国营造学社。他在南京江南图书馆发现了一册影宋本《营造法式》,这是我国土木建筑的第一要笈。作者李诫,字明仲,宋代营造家,负责宫室营建的官员。《营造法式》是他奉勅编纂的,编于熙宁年间,成书于元符三年,刊行于崇宁二年。全书三十六卷,按内容可以分为名例、制度、功限、料例、图样五个部分,其中用很大篇幅列举了各种工程的制度,包括壕寨、石作、大木作、小木作、雕作、旋作、锯作、竹作、瓦作、泥作、彩画作、博作、窑作共十三种一百七十六项工程的尺度标准以及基本操作要领,而且各种木制构件、屋架、雕刻、彩画、装修等都有详细图样。这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、施工的规范书,这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。我国匠艺往往通过口耳相传,很少见于记载,这部书更是集大成之作。平生关注匠艺的朱先生见之大喜,搜集他本汇校后重刊。

《营造法式》的重刊,引起了国内外关心中国建筑艺术人士的浓厚兴趣,朱先生顺势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。时为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四日。他在学社成立《缘起》中说:“方今世界大同,物质演进,兹事体大,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,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。启铃无似,年事日增,深惧文物沦胥,传述渐替,爰发起中国营造学社,以合同志者而人,商略义例,分别部居,庶几绝学大昌,群才致用。”学社原拟名“中国建筑学社”,后以范围过狭而改称。朱先生解释说:“顾以建筑本身虽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重要之一端,然若限于建筑本身,则其于全部文化之关系仍不能彰显,故决破此范围而名以‘营造学社’,则凡属实质艺术无不包括。由是以言,凡彩绘、雕塑、染织、髹漆、铸冶、传植,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,推而极之,凡信仰、传说、仪文、乐歌,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

民俗学家之事,亦皆本社所应旁搜远绍者。”可见其学术眼光之广阔高远。

他以自己广广的人脉,聚合了一大群中外学界、工商界、金融界、政界的精英分子,仅我熟悉的学界人士就有陈垣、袁同礼、马衡、叶恭绰、梁思成、林徽因、陈植、叶公超、刘敦桢、单士元、刘宗江、李四光、谢国桢、李济,这些人分属历史、考古、外国文学、建筑、地理、地质等学科,可见朱先生将中国营造学研究置于一个非常广阔的多学科背景里。尤其是梁思成、林徽因、刘敦桢的加盟,使学社立即活跃起来。他们刚从国外学成归来,学贯中西,又热爱中国建筑艺术,年青力壮,精力旺盛,在学社的组织下,他们展开了对河北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、浙江等省古建筑遗存的调查,取得了丰富的资料,撰写了大批价值极高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,并在此基础上校订、研究《营造法式》。抗战期间,梁思成、林徽因、刘敦桢、刘致平流亡西南,成立营造学社分社,继续进行西南建筑、雕塑的调查和研究,并恢复《营造学社汇刊》。抗战胜利不久,由于朱先生散尽了家财,经费山穷水尽,学社名存而实亡。

中国营造学社存在十五年,正常工作实际只有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七年。在短短七年里,完成了古建筑二千七百八十三处、建筑群二百零六组的调查,基本弄清了我国建筑发展的脉络和历史源流,共出版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》七卷二十二期,图书三十一种,以后梁思成的名著《中国建筑史》《中国雕塑史》也是建立在这七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的。这是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建筑之始,而且成就巨大,此后再没有超过中国营造学社的水平。邓云乡先生认为,现在尚存的北京协和医院、燕京大学(现北大)、北海图书馆、南京中山陵藏经楼等,一大批中国宫殿式美轮美奂的建筑物的出现,不能说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影响没有关系。营造学社造就了一大批中国古建筑人才,他们都对朱先生很尊敬,执弟子礼,梁思成、刘敦桢尊称“桂师”,刘宗江、刘致平、陈从周更是如此。可惜这些人以后在厚今薄古的环境下未得大用。

朱先生还是成功的实业家,曾经经营中兴煤矿,创办中兴轮船运输公司,开银行,这些都是很赚钱的生意。他的钱花了不少在创办中国营造学社、开发北戴河、出版古籍这些有意义的事情上。

以上是朱先生一生事业的荦荦大端。朱先生集实业家、营造学家、文物收藏家于一身,尤其对文化上贡献甚巨,然其出身并非科举高第,其才干是天赋加勤奋,主要靠历练而来的。好些书,包括权威的《中国近代史词典》《辞海》都说他是举人,但朱先生自撰年谱却只字未提。中举是旧时代人生大事,成了举人小可光宗耀祖,大可以有了做官的初步资格,倘实有其事,焉能不著一笔?不要说中举,连秀才都没有记载。他是靠姨父翟鸿禧代捐一个府经历起家的。

朱先生家本黔之开州(民国改紫江县,又改开阳县),却出生在河南信阳,外祖父傅寿形的南汝光兵备道署,三岁丧父,与母亲相依外家为生,由河南而湖南。二十岁时姨父翟鸿禧提督四川学政,将先生带往四川历练。他长于做事,翟倚为左右手,走到哪里带到哪里。翟离任,为他捐了一个从七品的府经历,从事盐务管理、开凿

险滩等事。这是朱先生接触工程之始,从此对土木建筑兴趣不减。后从瞿赴江苏,入京师,充京师大文研究馆馆员,九十寿辰时,周恩来总理送花篮祝贺,他也邀请周总理到家里作客,吃贵州菜。朱先生是贵州人,虽然终生未履乡土,但对家乡的感情还是有的。他外祖父傅寿形是贵阳名士,进士出身,历任河南知府、道员、按察使,外祖母与其祖母是亲姊妹,同出贵阳刘氏,他的两个姑母嫁给他两个舅父。咸丰、同治间贵州战乱,朱、傅两家人都逃往河南依傅寿形住,一家上下数十口都操贵阳话。他三岁时父亲溺水死,他随母亲傅梦琼在外家长大,他的第二位夫人是贵阳于氏,从小到老,耳边都缭绕着乡音。他母亲做得一手地道的贵阳菜,而做得最多的是豆腐、豆豉,因为他外祖母喜欢家乡的家常菜。晚年编家乘回忆母亲,用两千五百字专门写豆腐、豆豉的做法、种类,津津有味,细致入微。樱桃斜街贵州会馆,是周渔璜先生去世后,其父捐邸宅为会馆,是为第一个贵州会馆。康熙年间的老宅,几经维修,至民国又已破败不堪,朱先生捐款一万四千银元维修、扩建,并作记。先生一生注意搜集乡邦文献,他整理出版了其外祖父傅寿形的《澹室室诗》、贵阳名士杨文照的《芋香馆诗》。贵州文献散佚在纂修《贵州通志》的同时编辑出版《黔南丛书》,朱先生与那端先生在北京也编印一部分,由朱先生出资刊印,是为别集,如明马士英《永城纪略》《永肤》等。黄彭年《陶楼诗钞》辑录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沧桑巨变,朱先生的产业荡然无存,只能蜡版油印。这些细事可以见出先生对乡土的关爱。

朱先生晚年将藏书捐赠北京图书馆(今国家图书馆),后又改变主意,要求北图将其中的贵州文献转赠贵州省图书馆。北图回复,没有复本两个以上的仍留在北图,但可制成缩微胶片交给贵州,复本超过两个的则赠贵州。现在贵州省图书馆存有《黔南丛书》,朱先生与那端先生在北京也编印一部分,由朱先生出资刊印,是为别集,如明马士英《永城纪略》《永肤》等。黄彭年《陶楼诗钞》辑录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沧桑巨变,朱先生的产业荡然无存,只能蜡版油印。这些细事可以见出先生对乡土的关爱。

朱先生的著述有《夔园文存》,编纂有《存素堂丝绣录》《紫江朱氏家乘》。《夔园文存》出版于一九三六年,铅印线装,函两册。函套和封面由祝书元题写,扉页由章棣书。前有祝书元、瞿宜颖两序,末有作者跋文一篇。文分上下三卷,卷上、卷中收任官时的公牍,卷下主要是书序、长辈行述墓表文序,共文章七十三篇。先生不以文章著,其文条分缕析,逻辑严密,语言朴实,明白晓畅,亦如他的为人治事。先生身居高位,平生所为,多关典章典故,这部文存的价值不言而喻,文字反成余事矣。

《夔园文存》后来又收入朱先生编纂的《紫江朱氏家乘》。二零一四年我主持《民国贵州文献大系》的编政,将此书收入第三辑重印。

2019年孔学堂夏季论辩大会举行 论辩“新天下秩序与儒学传统”

近日,2019年孔学堂夏季论辩大会在贵阳举行。论辩大会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教授,美国洛杉矶罗耀拉大学终身哲学教授王蓉蓉,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于春松,围绕主题“新天下秩序与儒学传统”展开论辩。论辩大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姚新中主持。

“天下”概念,中国三千年前早已有之,见于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周易》等先秦文献。赵汀阳运用这一古老的概念,立足于当代社会,提出“新天下体系”理论,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。论辩现场,赵汀阳首先解释了“天下”的概念:一是人类全部的活动空间;二是人心,指普天之下人们的共同选择;三是普遍制度,也就是政治意义上的天下。

“只有三层意义的‘天下’完全重叠,才可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的‘天下体系’。”赵汀阳认为,“天下体系”属于全世界的共享体系,而非属于某一国或者某一主义。其未来的形态将是一个高科技、网络化体系,包括互联网、人工智能、基因生物学、新能源等,这些技术系统将把全人类的存在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。

王蓉蓉则从哲学理论角度解释“天下”这一概念。她说,“天下”是建立在关系理性基础上的,关系理性有矛盾、相依、交感、互补、转化等要素,也是中国思维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式。比如矛盾,是对立、冲突,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。怎么来解决这个冲突?在中国并不是用你输我赢的对立思维方式,而是依靠大家互相和谐、共生共荣来解决矛盾。回归到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来看

当代“天下”,对建构国际秩序将有很大帮助。

“讲故事、接地气、交朋友,是求得世界共识的三个方法。”王蓉蓉说,每一种文化、一个国家或每一个人都有故事,我们要通过“讲故事”“接地气”的方法来感动别人;同时,不但要交志趣相投的朋友,也要交价值观不同的朋友,倡导文明对话,才能达成共识。

于春松对儒学传统的当代转换进行探讨。他说,儒学在当代社会的作用,更重要的是让大家熟悉中国传统文化,然后才能对传统进行转换性改造。他引用著名哲学家李泽厚的观点,阐释传统文化对当代人的影响,更多体现在文化——心理结构层面。所以,与其批判或者追捧传统文化,不如正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

作用,才能找到一条让传统文化在现代发挥作用的正道。

台上论辩精彩纷呈,台下听众也结合时下的中美贸易冲突、个体权利与国家集体的关系等问题,与学者们展开积极互动。

论辩大会进入尾声,姚新中给出如下总结:“‘天下’是先秦儒学的一个核心概念。‘天下’在《论语》中出现了23次,在《礼记》中使用了127次,在《孟子》中提到173次,在《荀子》中则出现了369次。这些数字告诉我们,‘天下’概念随着儒学思想的发展而越来越重要。‘新天下体系’与儒学传统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,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,必然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织,是一种文明对话过程。唯有如此,才能形成天下秩序的新共识。”

本报记者 刘辉 文/图



图为论辩现场。

评弹 华语电影格局需要继续扩大

韩浩月

日前,第25届华鼎奖“中国电影满意度调查”各项大奖提名揭晓。《我不是药神》以八项提名领跑最佳影片候选名单,《红海行动》《无双》《无名之辈》《影》参与最佳影片竞争,《江湖儿女》《无问西东》《阿拉姜色》等2018年备受关注的作品,也均有奖项提名。如此多佳作入围,使得本届华鼎奖迎来该奖项“史上最强竞争”。

“格局”或可成为评价本届华鼎奖提名名单的一个关键词。尽管2018年中国电影市场冷热交替、喜忧参半,但有了这份入围影片名单,基本上可以确认一点:华语电影创作在机遇与困难并存、变数极大、无规律可循的背景下,仍然不停在尝试题材拓展、主题升华,仍然在勇敢地寻找观众的需求、触摸电影的表达边界。把电影精神与观众市场相结合,也依然是新老电影人心中最高的追求与荣誉。

华语电影在题材与创作格局上的放大令人振奋,这种迹象可以让人暂时忽略烂片扎堆的乱象,把视线放在头部内容所绽放的新气象上来。

《我不是药神》第一次用大银幕的形式,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相关的医药问题呈现出来,明显扩大了现实题材的格局。在满怀悲悯、同情的同时,有着沉稳、准确的批判,但同时也传递出向善向暖的价值观,让所有人都意识到,电影是可以集结共识、改变社会的,电影的力量感令人敬重。

《江湖儿女》《无名之辈》用新的眼光与角度,对底层格局进行新的理解与书写。在这两部电影的叙事中,对底层生存逻辑有着清醒但却不乏感性、温情的梳理。《江湖儿女》中人物生存的仪式感与浪漫姿态,《无名之辈》中人物在面有缺憾的生活时所爆发出的强大,都在试图去除底层生活里根深蒂固的卑微、困顿,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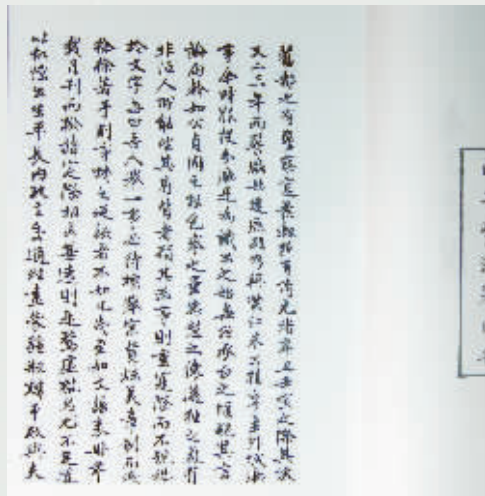
想要展现小人物在生活与命运重压下的诗性追求。这样的诉求,使得电影走出了同类题材作品的狭小,拥有了被本土观众接受的更多可能性。

《无双》被誉为是继《无间道》之后令人印象最深刻的香港电影。它由内地公司主导投资,但在制作上却让人感到久违的香港气息。《无双》的优点是,它延续并拓展香港动作、犯罪题材的独特风格,但创作思维却走出了“香港制造”的固有模式,尤其是在编创上的悬疑路线,可以看到近年日本、美国流行悬疑小说的魅力。香港电影通过《无双》展现出一种变化:从无原则讨好内地市场,到彰显香港电影的核心魅力,创作更符合国际审美的故事。《无双》所开辟的港片新格局,应该继续下去。

《无问西东》公映于2018年1月,公映期引起很大范围内的讨论,后期因为其他影片的崛起,导致这部上映较早的作品延伸价值未能得到更多的肯定。在缺席诸多国内电影奖项之后,《无问西东》的提名出现在本届华鼎奖,它如同电视剧领域的《风筝》一样,需要通过奖项的认可,来发现它的独到之处。《无问西东》的优秀,是可以经得起时间考验的,它的历史格局是开阔的,它为一段被遗忘的历史赋予了情怀与人文色彩。

同时,它并没有被历史题材所累,观赏性很强,故事与角色、编剧与表演都是上乘的。期待它最终能在本届华鼎奖有所斩获。

通过近年的获奖名单来看,华鼎奖的多元表达与华语电影的内在追求是一致的、同步的。无可否认的是,格局放大、多元表达,是华语电影参与国际竞争必不可少的条件,也唯有这两个条件,会成为文化自信的有力支撑,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,华语电影都应积极应变,目标向上而坚定,唯有如此,脚步才不会停滞于原地。



《夔园文存》内页。